希腊-世界的"中国"之殇

张 沛

摘 要:根据修息底德的记载,所谓"全希腊的学校""其他城邦模仿的范例"或者说作为世界之"中国"的雅典根本就是一个"帝国"——一个对内施行民主(共和或自由政体)、对外通过暴力(伯里克利所谓"僭主政治")维持的海洋帝国。雅典自诩"中国"不过是一种修辞,即以"中国"(ἀρετή)为名推行帝国统治(ἀρχή)之实,而斯巴达则从一开始就将反对雅典帝国霸权、解放希腊、恢复自由作为自己的战争口号,由此赢得了人心并最终战胜了对手。然而,斯巴达"王者归来"后,"中国"并未随之重返希腊。这不仅是雅典和斯巴达"帝国"的悲剧,也是希腊世界"中国"理想的沦亡。更可悲的是,雅典—斯巴达的"中国—帝国"悲剧此后不断重演,而以之为原型和起点(ἀρχή)西方世界陷入了历史的恶性循环。

关键词:希腊 稚典"中国"世界

传说古希腊米利都哲人阿纳克西曼德(Anaximander,前 610—前 546)绘制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张世界地图。这张地图标识了当时希腊人所认知的人类世界:它以爱琴海希腊(很可能就是米利都)为中心,四周被大洋(Ωκεανός)环绕,并被黑海和地中海一分为三,其中黑海 – 地中海以北为欧罗巴,东方为亚细亚,南方为利比亚,欧罗巴与亚细亚以黑海 – 帕西斯河(Phasis)为界,亚细亚与利比亚以尼罗河为界,欧罗巴与利比亚以地中海为界。

一百多年后,同样来自小亚细亚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前 484—前 425)为我们呈现了一幅更加广阔也更加具体

的世界图景。在希罗多德的世界中,欧罗巴向西、向北拓展,利比亚之外复有埃及(这构成了世界的第四极)、埃塞俄比亚,而亚细亚则包括了巴比伦、阿拉伯、印度和波斯等地区。与之相应,这个世界的原点和重心也发生了位移:过去,德尔菲(Delphi)被认为是天地之中(所谓"大地之脐"[ὁμφαλός]^①);现在,雅典成了希腊世界——因此也是人类世界——的中心。

这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位移, 更是心理和价值(黑格尔则会说是"世界精神")的位移, 而这一切都和公元前 5 世纪在希腊本土发生的两场"国际战争"大有关系。

第一场战争是希波战争。公元前 499 年,波斯王大流士派兵攻打希腊纳克索斯岛(Naxos),希波战争由是正式拉开帷幕。公元前 490 年,波斯军队跨海(爱琴海)人侵希腊本土,雅典将军米提亚德(Miltiades)率兵在马拉松平原成功狙击来敌。十年后,波斯王薛西斯亲率百万雄师。跨海人侵希腊本土,斯巴达、雅典率领希腊联军奋起反抗,分别在温泉关和萨拉米斯战胜来敌,薛西斯狼狈败走;次年(公元前 479 年)希腊联军在普拉提亚战胜波斯人,希腊特别是雅典从此取得爱琴海-黑海的海上霸权。正是在与强大的"东方"他者——波斯的对峙过程中,希腊世界的中心认同发生了位移。

在战前,宗教圣地德尔菲被认为是希腊乃至人类世界的中心。它 是希腊各邦的咨询与决策中心,也是全体希腊人的公共金库和精神首 都。公元前7一前6世纪,善政(εὐνομία)和平等法制(ἰσονομία)、

① Plato, *Republic*, 427c. 参见〔古罗马〕斯特拉博: 《地理学》第 9 卷第 3 章, 李铁匠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5 年, 第 621 页。〔古罗马〕普鲁塔克: 《道德论集》(*Moralia*)第 4 卷"神谕为何不再出现"(Why the Oracles Cease to Give Answers)章第 1—2 节。

② 这是一支史无前例的大军:根据希罗多德的估算(参见《历史》第7卷第60—99节、184—187节),它包括1207艘战舰、海军将士517610人,步兵1700000人,骑兵80000人,阿拉伯骆驼骑兵和利比亚车战兵20000人,共计2317610人;如将欧罗巴各族战士与后勤人员也计算在内,人数则将超过500万(希罗多德给出的数字是5283200)。

僭主制度和人民统治(δημοκρατία)先后兴起^①,德尔菲的传统权威开始受到挑战。挑战首先来自斯巴达。公元前 7 世纪,斯巴达人率先建成"善政"^②——在后代的叙述中,"善政"几乎就是"斯巴达政制"的同义词——而成为希腊城邦政治的领袖楷模,即如罗马帝政时代的希腊历史学家普鲁塔克(Plutarch,46—120)所说:当时的斯巴达被视为全希腊的"老师和教练"(παιδαγωγὸν ἢ διδάσκαλον)^③。不过更大的挑战来自后来居上的雅典,而后者在希腊世界的崛起正得益于希腊人和波斯人的世纪之战。

斯巴达本为希腊盟主,但在波斯人入侵希腊本土时逡巡观望,而雅典则因首当其冲,不得不背水一战。公元前 490 年,雅典军队在马拉松平原迎战波斯人并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如希罗多德所说:过去希腊人一见"米底人"(即波斯人)就心生畏惧转身逃跑,而雅典人是"第一支看到波斯的服装却面无惧色"并"奔跑着冲向敌人"的希腊人[®]。十年之后,雅典人又在萨拉米斯海湾击退了大举来犯的波斯海军。这是一次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雅典从此成为与斯巴达并驾齐驱的希腊"第一城邦"(πόλις πρώτη τῶν ἐν τῆ Ελλάδι)[®],甚至是和波斯 – 亚细亚 – 东方分庭抗礼的希腊 – 欧罗巴 – 西方世界代表。换言之,通过对抗并击败东方的"蛮夷"(βάρβαροι)——波斯人(包括被波斯征服的米底人),雅典俨然成为希腊世界的"中国"。

在中国、"中国"一词初见于西周何尊铭文,所谓"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意指当时"天下之中"的成周京师洛邑。(《诗·大雅·民劳》:

① 参见[英]齐默恩:《希腊共和国》第8—10章,龚萍、傅洁莹、阚怀未译,上海:格致出版社, 2011年,第97—99、103—107、117—133、138—141页。另见[英]奥斯温·默里:《早期希腊》第15章,晏绍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69—270页。

② 参见[古希腊]希罗多德:《历史》,第1卷,第65—66节。

³ Plutarch, Life of Lycurgus, XXX, 50

④ 〔古希腊〕希罗多德:《历史》第6卷第112节,徐松岩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第338页。 参见本书第9卷第27节中"雅典人"的说法: "在全体希腊人当中,是我们单独抗击波斯人;不 仅如此,在如此危险的一场恶战中,我们击败了敌人,战胜了四十六个民族。"(中译本第479页)

⁽⁵⁾ Herodotus, The Histories, VI, 109.

"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惠此京师,以绥四国。"《汉书·地理志下》:"昔周公营雒邑,以为在于土中,诸侯蕃屏四方,故立京师。"又杜甫《有感》其三: "洛下舟车人,天中贡赋均。")"中国"或京畿之外的"王土"(《诗·小雅·谷风之什·北山》"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则依次区分为"五服",所谓"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按:亦称绥服),夷蛮要服,戎狄荒服"(《国语·周语上》),另一方面,"中国"也是界定文明与野蛮("严华夷之辨"、"内诸夏而外夷狄")的人文政治概念,如《战国策》中赵公子成所说:

中国者,聪明睿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

就此而言, "中国"不仅是"中于天地"(《法言·问道》)的地域实体(中国之地),更是古人所谓"皇极"或"大中"(《尚书·洪范》:"皇极:皇建其有极。"孔安国传:"太中之道,大立其有中。"蔡沈注:"极:犹北极之极,至极之名,标准之名,中立而四方之所取正焉者也。")的政治理念(中国之道)。

后一种意义上的"中国",即"皇极"或"大中之道",与古希腊人说的"àpxń"(始基-本原-元首;权力-统治-帝国)异曲同工,在特定语境下几可等量齐观。古希腊人认为希腊地处人类世界的中心,而雅典又是希腊世界的中心。雅典人(如伯里克利、色诺芬[®])自不待言,甚至外邦人也这样认为,如来自希腊小亚细亚地区多利安人城邦哈利卡那索斯(Halicarnassus)的希罗多德在他著述的《历史》中开篇不久就告诉我们:多利安人的斯巴达和爱奥尼亚人的雅典是希腊最强大的两个城邦;前者从外而来(如希罗多德所说,他们经过四次迁徙

① 参见「古希腊〕色诺芬:《雅典的收入》,张伯健、陆大年泽,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74页。

才来到伯罗奔尼撒),而后者为原住民(吊诡的是,他们却非希腊人)的后代(第 1 卷第 56 节) $^{\circ}$ 。雅典人在希波战争中的卓越表现(ἀρετή)为他们赢得了更大的尊重和权力愿景,并使他们以希腊 – 世界的"中国"自居 $^{\circ}$ 。

希罗多德本人为我们提供了权威的证词。他在《历史》第7卷中 讲到薛西斯大举进攻希腊时加入了一段自己的评论(第138—139节);

波斯国王此次出征,虽然名义上是直接进攻雅典,但实际上 意在整个希腊。希腊人早就知道这一点了,但是他们对此事的看 法并不一致。

在这里,我不得不发表一个意见,虽然大多数人是不喜欢这个意见的。但是,只要我觉得是真知灼见,我决不会避而不谈。假如雅典人被迫在眉睫的危险所吓倒,从而离弃他们自己的国家,或者他们虽不离开,却留下来向薛西斯投降,那么就肯定没有人企图在海上抗击波斯人了;而如果没有人在海上抗击波斯人,那么我以为在陆地上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以上两种情况无论发生哪一种,希腊都将为波斯人所征服。……既然如此,如果说雅典人是希腊的救星,那就的确是一个真知灼见了。雅典人所处的是举足轻重的地位,哪一方得到他们的支持,哪一方就会得胜。

① 参见本书第 7 卷第 161 节中"雅典使节"的说法: "我们雅典人是希腊人当中最古老的民族, 又是希腊人当中唯一一支从来没有改变过居住地的民族"(中译本第 398 页)。又伊索克拉底 也在《泛希腊集会辞》中强调(Panegyricus, 24—25): "自有史以来,我们就一直占据着这 个生育我们的地方,我们是土生土长的能够用称呼最亲近的人的名义来称呼我们的城邦,因为 在希腊人当中唯有我们有权利称呼我们的城邦为妈妈(τροφὸν)、祖国和母亲。"(《古希腊 演说辞全集·伊索克拉底卷》,李永斌译注,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15 年,第 81— 82 页)

② 参见柏拉图《厄庇诺米斯》(*Epinomis*, 987d)中"雅典人"的说法: "我们全体希腊人都应该记得的是,我们所拥有的地方在整个希腊人中,对于[培养]德性(ἀρετὴν)来说几乎是最好的地方。"(程志敏、崔嵬编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年,第23页)对此,他的两名同伴——克里特人克莱尼阿斯(Κλεινίας)和斯巴达人麦吉卢斯(Μέγιλλος)——并无异议。

雅典人所抉择的是希腊应当保持自由;也正是他们,激励尚未归降波斯人的那些希腊人,而且正是这些人,在诸神的庇佑下,击退了入侵者。即使那来自德尔菲的使他们感到心惊胆战的神谕,也未能使他们动摇而离开希腊。他们依然坚守着自己的故土,鼓起勇气迎接着来犯之敌。^①

希罗多德在此强调:关键时刻,正是雅典——既非传统的城邦盟主斯巴达,亦非古老的神道中心德尔菲——挺身而出领导希腊文化共同体[®] 反抗波斯帝国并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一胜利具有双重意义:首先,这是希腊对波斯的胜利,确切说是雅典代表的希腊城邦 – 共和(πολιτεία)战胜了波斯代表的东方暴君专制,或者说"中国"战胜了"蛮夷"——希罗多德的《历史》即是对这一世界历史事件的全景再现。其次,这是雅典对希腊的胜利,确切说是"新中国"雅典战胜了"旧中国"德尔菲以及"另一个中国"斯巴达。当日波斯"蛮族"大兵压境,雅典政府紧急遣使至德尔菲请示神谕,而神(确切说是阿波罗神庙的女祭司)的答复是:

不幸的人,你们为何坐在这里?快逃吧,逃到地角天涯,逃离你们的家园,离开你们那围以城墙的高高的卫城, 躯体和头颅,实际上都同样不能保全, 双手和双脚,以及中间的一切也都变得僵硬无力。

① 徐岩松译本第 387-388 页。

② 关于当时希腊人对希腊文化共同体的认同,参见〔古希腊〕希罗多德:《历史》,第8卷,第144节"雅典人"的说辞: "全体希腊人在血缘上有亲属关系,我们有共同的语言,都参拜共同的神坛,施行共同的牺牲仪式,我们还具有相同的品性"(中译本第468页)。事实上,希腊正是在与东方他者——从传说中的特洛伊到现实中的波斯——的对抗或者说敌我关系中获得了自我意识和身份认同。参见第7卷第145节(中译本第391—392页): "现在(按:即公元前480年),全体愿意保卫希腊的希腊人,就都聚集在一起开会,相互商议并立誓结盟……他们希望,如果可能的话,把全体具有希腊血统的人团结起来,同心协力,共同参与保卫希腊的战斗,因为迫在眉睫的危险正威胁着所有希腊人。"

这一切都将毁灭。①

使者闻言大惊。经本地高人指点,他们再次以求援者的身份进入圣域 求告神灵,又得到了第二个神谕:

富有远见的宙斯终会给雅典娜神的这些祈求者 一座木墙,作为保全你们以及你们子孙的屏障。

.

神圣的萨拉米斯啊!在人们播种或收获的时候, 你会把妇女们所生的孩子全部毁灭。^②

这个神谕也让雅典人惊疑不定。根据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的 机智解说,所谓"木墙"原来指的是雅典的战舰,而"妇女们所生的孩子"指的是波斯人。质言之,神灵指示雅典人将在海上击败来犯之敌——他们后来果然也做到了。就这样,雅典人改写(事实上是反抗)了德尔菲的神谕,也改写了自己和全体希腊人的命运(即"自作元命")。从此,雅典人不再为城邦政治事务专门请示神谕^③:他们成了自身政治生活的主人。与之相应,整个希腊世界——现在雅典是它的中心——的城邦政治也正式启动了世俗化(即去神权化,这是人类政治走向民主的第一步)和现代化的进程^④。

雅典与斯巴达的关系则更加微妙,相互竞争也更加激烈。公元前7世纪,斯巴达以其善政政治实践(同时也是一种政治理念或意识形态)称雄希腊世界;在下一个世纪(确切说是公元前510年之后³),雅典

① 〔古希腊〕希罗多德: 《历史》,第7卷第140节,中译本第389页。

② 同上。

③ 参见〔英〕普莱斯:《古希腊人的宗教生活》,邢颖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87页。

④ 参见〔英〕齐默恩:《希腊共和国》,第149页。

⑤ 是年雅典人驱逐了庇西特拉图(Peisistratus)之子希庇阿斯(Hippias),从而结束了他们父子两代长达36年的僭主统治。参见希罗多德《历史》第1卷第59—64节、第5卷第55—78节。

始以平等法制(ἰσονομία)——亦称 "平等自由"(ἰσηγορία)——领 跑希腊城邦政治[®]。两极(ἀρχαὶ)并立互不相能,于是有"中国"领 袖(ἀρχή)之争,史称"伯罗奔尼撒战争"。此为古代西方世界一大 转折 – 变局(catastrophe),即如修息底德——他不仅亲历了这一变局,而且也是讲述这场变局的第一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中 开宗明义所说(第 1 卷第 1 章):

大敌当前,拉栖代梦(按:即斯巴达)人执掌希腊联军的指挥权,因为他们的势力最强大[®]。(略)共同的联盟把异邦人击退。但是不久之后,希腊人的联盟分裂为两个集团:一个集团以雅典为领袖,一个集团以拉栖代梦为盟主。在希腊,一个在海上称霸,一个在陆地上称雄。在一个短时期内,联盟还继续维持着;随后拉栖代梦人和雅典人争端即起,双方及各自的同盟者彼此以兵戎相见,而所有希腊城邦或迟或早地加入一方或另一方,虽然他们起初是保持中立的。(第18节)

这是迄今为止历史上——不仅是希腊人历史上,而且是大部分异族人历史上,甚至可以说是全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骚动。(第1节)[®]

事实上,这不仅是一场关于希腊世界帝国霸权的海陆 - 武力对决,也

① 参见〔古希腊〕希罗多德:《历史》,第5卷,第66节、第78节。

② 参见[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5卷第16章第26节: "我经历了战争的 全过程,我的年龄使我足以理解发生在身边的事件,为了探求事实真相,我密切关注事态发展。 我在指挥安菲波里斯的战事以后,曾被放逐而离开本国二十年。我目睹战争双方的一切行动, 特别是伯罗奔尼撒人的军事行动,因为我流亡在外,使我有空闲时间更加深入地探究战争的进程。"(徐松岩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82页)

③ 不过后来(公元前477年,即萨拉米斯战役胜利后第三年)雅典人借口斯巴达统帅专横跋扈而取消了斯巴达的领导权(参见希罗多德:《历史》第8卷第3节,〔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卷第4章第94—96节)。

④ 中译本第3页、第12页。

是一场关于"中国道路"或人类理想政制的观念 - 话语之争。对此,雅典城邦的"第一人"和实际统治者里利克利^①有充分的自觉。如他在战争爆发当年岁末即公元前 431 年冬为阵亡将士举行的国葬典礼中致辞晓喻雅典人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 2 卷第 6 章):

我们的宪法(πολιτεία)没有照搬任何毗邻城邦的法律,相反地, 我们的宪法却成为其他城邦模仿的范例(παράδειγμα)。我们的 制度之所以成为民主制,是因为城邦是由大多数人而不是由极少 数人加以管理的。(略)法律在解决私人争端的时候,为所有的 人都提供了平等的公正;在公共生活中,优先承担公职所考虑的 是一个人的才能,而不是他的社会地位,他属于哪个阶级;任何人, 只要他对城邦有所贡献,绝对不会因为贫穷而湮没无闻。我们在 政治生活中享有自由,我们的日常生活也是如此。(第37节)

一言以蔽之,我们的城邦是全希腊的学校(παίδευσιν)。我 认为世界上没有人像雅典人这样,在个人生活的许多方面如此独 立自主,温文尔雅而又多才多艺。(略)我们勇敢无畏地攻入每 一片海洋,进入每一块陆地;我们在各地所造成的不幸,或所布 施的恩德,都为后世留下了不朽的纪念。(第41节)^②

战争第二年,一场史无前例的恐怖瘟疫袭击了雅典。为此承受了巨大 压力的伯里克利被迫再次向城邦喊话(《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2卷 第7章):

目前整个世界可分为两部分: 陆地和海洋。其中整个一部分

① [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2卷第7章第65节(中译本第114页): "雅典虽名义上是民主制,但事实上权力掌握在第一公民手中。"("ἐγίγνετό τε λόγφ μὲν δημοκρατία, ἔογω δὲ ὑπὸ τοῦ πρώτου ἀνδρὸς ἀργή.")

② 中译本第 98-99 页、第 101 页。

几乎完全处于你们的控制之下——不仅包括你们现在所利用的海域,还包括更大范围的海域。(略)如果通过你们的努力保全自由的话,我们所是取得将轻而易举地得到补偿;一旦屈从于别人,那你们现在所拥有的东西也将化为乌有。(第62节)

对你们而言,拒绝承担帝国的责任,同时又企图享受其荣誉,这是不可能的。(略)假如在危难时刻你们当中确实有人曾认为放弃帝国是一种正直的事,那么放弃这个帝国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坦率地说,因为你们的帝国已经成为一种僭主政治(τ upavví δ a);过去取得这个帝国也许是不公正的,然而放弃这个帝国是不可能安全的。(第63节) $^{\odot}$

时至今日,伯里克利终于不得不承认:所谓"全希腊的学校""其他城邦模仿的范例"或者说作为世界之"中国"的雅典根本是一个"帝国"——一个对内施行民主(共和或自由政体)、对外通过暴力(伯里克利所谓"僭主政治")维持的海洋帝国。

在此,我们大有理由怀疑雅典自诩"中国"不过是一种修辞,即以"中国"(ἀρετή)为名推行帝国统治(ἀρχή)之实。战争第四年,即公元前427年,伯里克利的继任者、当时最得人心的民主政客克里昂(Cleon)向雅典城邦发表演说鼓吹严惩起义反抗暴政的米提林(Mytilene)——杀死全体成年男性,全体妇孺发放为奴——时即公然叫嚣(《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3卷第9章):

你们完全忘记了,你们的帝国是一种对臣民的专制统治 (τυραννίδα),你们的臣民都是些心怀不满的谋反者;他们服从你的基础,不是你们自杀性的让步,也不是他们对你们的忠顺,而是你们靠武力取得的优越势力。(第 37 节)

① 中译本第 111-112 页。

对于一个帝国,最为致命的弱点有三个,它们是:有同情心、感情用事、宽大为怀。(略)如果你们不论是非正误,坚决要维持你们的统治的话,那么你们就必须贯彻你们的原则,按照你们的利益.来惩罚这些米提林人。(第40节)^①

虽然他的提议最终被否决——如其反对者狄奥多图斯(Diodotus)所说,帝国的安全取决于正义的统治而非严刑峻法,正是这一点打动了雅典人民[®]——但是雅典 – 伯利克里的帝国计划[®]已经启动,并将按照自身的逻辑和意志无情地运转和开展下去。

战争第十六年,即公元前416年,雅典远征米洛斯(Milos)—— 米洛斯人为斯巴达后裔,起初保持中立,后因不满雅典暴力统治而奋起反抗——并悍然宣称(《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5卷第17章);

当今世界通行的规则是,公正的基础是双方实力均衡;同时 我们也知道,强者可以做他们能够做的一切,而弱者只能忍受他 们必须忍受的一切。(第89节)

我们对神灵的信仰、对人们的认识使我们相信,自然界的必然法则就是将其统治扩展到任何可能的地方。这个法则并不是我们的首创,也不是我们首先将它付诸行动;我们发现它由来已久,并将与世长存。我们现在的所作所为只是运用了这个法则,你们及其他任何人如果有了我们现在的实力,也会做我们现在所做的

① 中译本第 154 页、第 156—157 页。

②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3卷第9章第46—49节。

③ 后来(公元前415年)伯里克利的义子,也是他的事业继承人亚西比德(Alcibiades,一译阿尔基比亚德、阿尔基比阿得斯)投敌斯巴达时将此计划和盘托出: "我们乘船前往西西里,如果可能就首先征服西西里的希腊人,然后再征服意大利的希腊人,最后进攻迦太基帝国和迦太基城。如果这些计划全部或大部分取得成功,我们将带着在那些地区所获得的所有希腊军队,并雇用大量的土著军队来进攻伯罗奔尼撒……然后我们将统治整个希腊世界。"(《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6卷第20章第90节,中译本第370页。)

雅典人占领米洛斯后,将其男丁尽数屠杀,妇女儿童全体贩卖为奴³。此时的雅典外强中干,已然从标榜"立中区之教""以德服人"的"中国"彻底蜕变为信奉"以力服人""强权即公理"的帝国主义国家——从伯利克里、克里昂、亚西比德到柏拉图笔下的卡利克勒斯(Callicles)、特拉叙马库斯(Thrasymachus)³等人,即为其前仆后继、一脉相承的精神代言和人格化身。

事实上,雅典的"帝国计划"在希腊世界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如修昔底德所说:战争初起时"人们普遍对雅典义愤填膺,不论是那些希望脱离其帝国的人们,还是那些担心被雅典帝国吞并的人们,其心情都是如此"。;而斯巴达则从一开始就将反对雅典帝国霸权、解放希腊、恢复自由作为自己的战争口号。,由此赢得了人心(据说当时大众舆论"明显地倾向于拉栖代梦人","希腊各邦和个人都在以言辞和行动来尽量援助他们"。)并最终战胜对手,取代雅典成为(确切说是重新成为)希腊世界的"中国"——至少时人有这样的期待。

然而这只是一种幻觉。事实上,斯巴达"王者归来"后,"中国"并未随之重返希腊。即如色诺芬笔下的雅典城邦使节奥托克利斯(Autocles)在公元前371年向斯巴达人呼吁和平时所说(《希腊史》

① 中译本第 313 页、第 316 页。

② 欧里庇得斯的悲剧《特洛伊妇女》(公元前 415 年上演于雅典)即是对此历史事实的同情再现,可见公道自在人心。

③ Cf. Plato, Gorgias, 483b-484c & 490a; Republic, 338c-339a.

④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2卷第6章第8节,中译本第85页。参见第7卷第23章第66节中斯巴达将领吉利浦斯(Gylippus)在叙拉古与雅典人决战(公元前413年)前的演说: "雅典人来到这个地方的首要目的,是想征服西西里;如果取得成功,随后他们就要征服伯罗奔尼撒和希腊其他地区。"(中译本第414页)

⑤ 即如斯巴达名将伯拉西达(Brasidas)后来(公元前424年)劝降雅典盟邦阿堪苏斯(Acanthus)时所说: "我们并不企求建立帝国,我们要努力去推翻帝国", "我们将和雅典人作战,以解放希腊"(《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4卷第14章第87节、第85节,中译本第238、240页)。

⑥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2卷第6章第8节、中译本第84—85页。

第6卷第3章):

现在你们总是在说"城邦必须独立自主(αὐτονόμους)", 然而你们自己才是城邦独立自主之路上的最大障碍。因为你们与 盟邦订立契约的首要条件是无论你们走到哪里,他们都要跟向哪 里。这难道符合独立自主的原则吗?(第7节)

而且,你们在这里建立一个十人政府,在那里建立一个三十寡头政府——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个更悖逆于独立自主精神的事情了;而你们所支持的这些统治者,并非依照法律,而是凭借赤裸裸的武力掌控他们城邦的内外事务。因此,这显然表明你们是乐于建立僭主暴政而非自由民主政府(πολιτείαις)。(第8节)^①

奥托克利斯的话正好印证了同时代另一位雅典人、演说家伊索克拉底(Isocrates)的观察。后者在《泛希腊集会辞》(c.380 BC)中抨击二十四年前(404 BC)斯巴达人在雅典的暴虐统治时指出:

他们是如此的无耻,破坏乱自己国家的法律,反而还谴责我们城邦的不公正……然而他们在三个月里未经审判所杀死的人比我们城邦在整个帝国时期所杀害的人还要多。(第113节)^②

三十多年后,他又在《致腓力辞》(346 BC)中别有用心并不无快意 地提到斯巴达的帝国末日:

不久以前, 拉西第梦人还是希腊人在海上和陆上的领导者,

① 色诺芬:《希腊史》,徐松岩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第249页。

② 《古希腊演说辞全集·伊索克拉底卷》中译本第 99—100 页。在其晚年最后完成的《泛雅典娜 节演说辞》(339 BC)中,伊索克拉底甚至不无夸张地指控说: "斯巴达人未经审判所杀死的 希腊人,比我们定居于此以来通过审判处以死刑的人的总和好要多。"(第66节,同书第 290 页)

但是经过留克特拉(Leuctra)的惨败后,他们就失去了在希腊世界的领导权。(第47节)

他们现在被迫与邻邦作战,所有的伯罗奔尼撒人都不信任他们,大部分的希腊人也憎恨他们,而他们自己的奴隶也在夜以继日地困扰着他们。(第49节)^①

在伊索克拉底看来,正是人性的狂妄导致了帝国——无论是雅典帝国 还是斯巴达帝国——的最终失败:

我们因为对未来的焦虑以及对自身事务的充分关注而成为了最杰出的城邦。但是,当我们想象着自己的力量是战无不胜之时,就很难能够逃脱被奴役的命运了。拉西第梦人也一样,因为生活节制且执行严格的军事管理制度,由一个在远古时期名不见经传的卑微城邦脱颖而出,使他们自己成为了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主人。可当他们变得过于傲慢,在陆地和上海到处扩张之时,就和我们一样陷入了危机之中。(《战神山议事会辞》第6—7节)②

如其所说,这不仅是雅典和斯巴达"帝国"的悲剧,也是希腊世界"中国"理想的沦亡。更可悲的是,雅典 – 斯巴达的"中国 – 帝国"悲剧此后不断重演,整个希腊世界——作为西方文明乃至现代文明的一个原型和起点(ἀρχή)——陷入了历史的恶性循环:

① 《古希腊演说辞全集·伊索克拉底卷》中译本第 128—129 页。

② 《古希腊演说辞全集·伊索克拉底卷》中译本第179—180页,另见《论和平》第95—103节、《泛雅典娜节演说辞》第97节(同书第218—219页、第297页)。关于雅典人的狂妄,参见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4卷13章65节最后一段的冷峻评论: "雅典当时的繁盛使雅典人以为他们什么事都能做到,可能的事和不切实际的事,他们都能够做到,不论他们的势力强大也好,不足也好。他们各方面的意外成功,使他们产生这种心态,认为凡是他们能够想到的,就一定能够做到。"(中译本第229页)在伊索克拉底看来,这些都是"没有文化"的一种表现。(《泛雅典娜节演说辞》第32节,并见第196节)

公元前 404 年, 斯巴达战胜雅典, 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 雅典帝国解体:

公元前 394 年, 雅典与底比斯建立反斯巴达同盟, 同年雅典将军科农(Conon of Samos)率波斯舰队在克尼多斯(Cnidus)大败斯巴达海军, 斯巴达失去制海权;

公元前 386 年,希腊接受波斯的"大王和平敕令"(King's Peace)^①:

公元前 378 年, 雅典建立第二次海上同盟, 两年后重获爱琴 海制海权:

公元前 371 年, 留克特拉战役, 底比斯战胜斯巴达, 底比斯帝国崛起 ^②:

公元前 362 年,曼丁尼亚 (Mantinea) 战役,底比斯与斯巴达两败俱伤,希腊世界愈趋混乱³;

公元前 338 年, 喀罗尼亚 (Chaeronea) 战役, 马其顿国王腓力大败雅典和底比斯率领的希腊联军, 入主中原; 同年成立科林斯同盟, 腓力当选为泛希腊波斯远征军领袖。

① 又称"妄塔基达斯和约"(The Peace of Antalcidas)。斯巴达、雅典和底比斯先后以此号令希腊世界,希腊实际上沦为波斯附庸。参见色诺芬《希腊史》第5卷第1章30—36节、第6卷第5章1—3节、第7卷第1章39—40节(中译本第194—196、264、291页)即如伊索克拉底后来所说,"波斯国王通过斯巴达人和一些雅典人的力量,把我们置于最危险的境地",现在"希腊大地再也没有任何地方能够完全免于兵燹之灾,也不能免于派系斗争、屠杀以及其他数不胜数的灾难"。(《泛雅典娜节演说辞》第158节、《致阿基达摩斯》第8节,《古希腊演说辞全集·伊索克拉底卷》中译本第309页、第519页。)

② 如伊索克拉底后来所说:底比斯人取得"辉煌的胜利"后忘乎所以而变得穷兵黩武,结果步了雅典和斯巴达帝国的后尘。(《致腓力》第53—55节,《古希腊演说辞全集·伊索克拉底卷》中译本第130—131页。)

③ 色诺芬在《希腊史》最后结尾处(第7卷第5章27节)苦涩地告诉读者: "尽管双方都宣称本方获胜, 但是任何一方的局势都没有丝毫好转,与战前相比,双方的版图、城市和影响力也没有一点增加, 而战后的希腊却比战前愈加混乱和无序了。" (中译本第325页)

这时,希腊实际上已经沦为蛮族政权[®]的附庸,也就是说"中国而为夷狄"了。四年之后,即公元前 334 年,亚历山大大帝率兵远征波斯,希腊的精神随之出走东方(史称"希腊化时代"),而"中国"从此永别希腊——直到一百六十六年后,它"乘愿再来"西土,但不是作为希腊,而是作为罗马——多年后也将进入"中国 - 帝国"生死轮回的人类永恒之城罗马。又许多年后,现代世界的两位立法哲人更将此称为人类历史的重演(recourse)或自然——人之自然,即权力意志——的永恒轮回(eternal recurrence)。



① 马其顿王国地处希腊世界和"中国"秩序的外缘,传统上被"中原人"视为蛮夷。如马其顿阿吉德王朝的"爱希腊者"(Φιλέλληνας)亚历山大一世(公元前498—454年间在位)参加公元前504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这一赛事只有希腊人可以参加)时即遭拒绝,经特别法庭裁决证明其希腊血统(马其顿王室自称是海格里斯的后裔)后始获参赛资格。(〔古希腊〕希罗多德:《历史》第5卷第22节;参见〔英〕保罗·卡特利奇:《亚历山大大帝:寻找新的历史》,曾德华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第27—28页。)